

# 在翻译学视域下的“金蛇王权”：在真实与虚构中重构晚明<sup>\*</sup>

高 博

**摘要：**《中华大帝国史》一直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西班牙修士门多萨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语境下，把大明皇帝独享的权力符号——“龙图腾”误读与误译为一种用金线绣成的蛇纹饰，由此引发了汉语学界关于“以蛇译龙”问题的讨论，我们把这种“他者”塑造的权力符号简称为“金蛇王权”。“金蛇王权”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改写的符号结构，其隐喻了一种16世纪欧洲视域下的他者之正面中国形象。而明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被欧洲视作一种优越的异质文明并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一现象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等多重历史经验的统合中，对中国的重新发现。

**关键词：**金蛇王权 晚明 中国想象 文化隐喻 解构与重构

## 一、如何诠释他者视域下的“金蛇王权”？

5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帝国史》一直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深远的文化辐射力。1585年，西班牙政治家、学者和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以西班牙语编纂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的读本，同年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出版刊印了第一版，以下简称为“1585罗马西班牙语首版”。其西班牙语书名是：*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世纪欧洲视域下的《中华大帝国史》与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WW012。

*sabidas as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e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s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sup>①</sup> 本文把作者和书名分别简称为“门多萨”和“中华大帝国史”。事实上，这部读本的汉译书名可以追溯到1998年何高济翻译的首部中译本《中华大帝国史》。该中译本的底本为1940年在北京刊印的英文影印本 *The History of the Kingdome of China*,<sup>②</sup> 《中华大帝国史》这一汉语书名就是以这部英文影印本为底本转码而来的。我们把“1585年罗马西班牙语首版”的完整书名翻译成中文是：《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根据中国典籍和到访中国的教士及其他人士的记述编撰》。由此，我们从书名中提取到一条关键信息：《中华大帝国史》是作者基于相关中国典籍和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记述汇编的，而并非是门多萨基于在中国的亲历见闻书写而成的。事实上，门多萨终其一生都未能如愿踏上中国的土地。然而，尽管与前辈传教士相比，前人的中国行纪大多是基于在华的亲身经历书写而成的，而《中华大帝国史》则是对前人史料的一种汇编和改写，但门多萨的中国读本却在文化影响力上较之于前人更胜一筹。《中华大帝国史》在1585年一经出版就成为了欧洲的畅销读本，并立即被翻译成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语言。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部不朽之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再版。特别是，《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语读本的最近的一次再版是在2022年，由西班牙皇家学院

① 此处及文中多处均沿用了16世纪西班牙语的书写，其与现代西班牙语拼写有异。“1585年罗马西班牙语首版”的版本信息参见〔西〕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著《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根据到访过中国的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述编撰》(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s y otra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Roma: Vicencio Accolti, 1585 )。

② 我们曾对《中华大帝国史》中译本的源流进行了考辨并得出结论：1940年北京英文影印本《中华大帝国史》的底本是英国汉学家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 George T. Staunton ) 编著的“1853—1854年英译本”《中华大帝国史》。该本又是从这部读本的英文首译本——“1588年伦敦英译本”《中华大帝国史》再编而来的，“1588年伦敦英译本”的参照底本则是“1586年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而“1586年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才是门多萨本人认可的最终西班牙语修订本。此观点参见拙作《《中华大帝国史》英译本、中译本和西班牙语本考辨》，《图书馆杂志》2020年第12期，第147—150页。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院士胡安·希尔 (Juan Gil) 主编，并由西班牙的何塞·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基金会 (Fundación Jose Antonio de Castro) 刊印出版。<sup>①</sup>

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两百年来历经岁月磨砺，门多萨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欧洲一直传承不息。对此，拉赫 (D. F. Lach) 充分肯定了这部读本的学术价值：“门多萨之书的权威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为18世纪之前的所有欧洲人撰写关于中国的著作，提供了参考基点和进行对比的依据。”<sup>②</sup>因此，我们不免质疑：门多萨究竟在文本中塑造了何种中国形象？他的晚明书写又何以超越了前人，成为了之后的两个世纪以来欧洲知识分子书写中国的范本？

带着上述疑问，让我们的思考与审视聚焦于这部读本中的一处有趣的细节：门多萨立足于16世纪的欧洲语境下，把大明皇帝独享的权力符号——龙图腾误读成了一种用金线绣成的“蛇” (serpiente)<sup>③</sup>，由此引发了汉语学人关于如何把中国龙翻译到欧洲语境的探讨，本文把这种“他者”塑造而成的权力符号简称为“金蛇王权”。多年来相关汉语学人关注到了这组错位的文化转码符号，然而，他们并未对“金蛇王权”的文化内涵，及其在彼时彼地印欧语境下被他者看视的合法化看视过程进行诠释。因此，本文以“金蛇王权”为逻辑切入点，对16世纪欧洲视域下中国形象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

其中，我们注意到，李寅学在《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的始末》中，对中国龙之欧译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sup>④</sup>对此，他指出，“龙”从汉语语境转码到欧洲

①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Madrid: Fundacion Jose Antonio de Castro, 2022.

② [美]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D.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Vol. I, book 2, p. 744)。

③ 门多萨在“1586年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中华大帝国史》中三次用“serpiente”——“蛇”来意指大明皇帝的权力符号，分别见于该本的第65、165、240页。

④ 参见李寅学《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的始末》，《中外文化关系论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第443—466页。

语境后在语义上已由积极转为消极了，因此，直接把“龙”翻译为“dragon”并不恰当。<sup>①</sup>面对汉语和欧洲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李寅学对翻译史进行了溯源，并发现早在唐代，玄奘就使用了音译法来解决佛经翻译中梵文和汉语之间的不可译问题。基于前輩学人的音译策略，他建议也用汉语拼音“lonng”或延用马若瑟的“long”来翻译“龙”。<sup>②</sup>

此外，李寅学还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意译方法把中国龙翻译为了“serpens”(巨蛇)。需指出的是，“serpens”是拉丁文，其原初意义是指蛇。<sup>③</sup>为此，他指出，方济会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的《鄂多立克东游记》(*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described by Friar Odoric*)，博克舍(C.R. Boxer)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记》(*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和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中国开教史》(*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以及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的《葡汉词典》(*Dicionário Portugués-Chinés*)，这些早期汉学家的著作都把中国龙翻译为了“serpens”(蛇)。<sup>④</sup>李寅学对上述转码策略进行了解读：“鄂多立克大概在欧文中难以觅得龙的影子，故而懵懂下乃以蛇代之；或是他们仅知龙为神物，但与欧龙不同，故而不敢也难以拉丁文“draco”或

① 参见李寅学《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的始末》，《中外文化关系论稿》，第465—466页。

② 同上书，第466页。

③ 第一部西班牙语单语词典《卡斯蒂利亚语或西班牙语宝鉴》出版于1611年，这是第一部用西班牙语来定义西班牙语词汇的词典，也是欧洲第一本通俗语言的单语词典。该词典对西班牙语“serpiente”的词条给出了如下释义：“serpiente, del nombre latino *serpens*, *serpentis*。”其翻译为汉语是：“蛇”的西班牙语书写是“serpiente”，其源于拉丁文“serpens”和“serpentis”。参见〔西〕塞巴斯蒂安·德·科瓦路瓦斯·奥洛斯科《卡斯蒂利亚语或西班牙语宝鉴》(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 Orozco, *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ñola*, 1611, usoz 6948, 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 Spain, p. 27)。

④ 参见李寅学《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的始末》，《中外文化关系论稿》，第455—456页。

其复数形式“draconis”记下传世。”<sup>①</sup>

上述关于中国的著作中，《鄂多立克东游记》流传的历史最为悠久，这也说明早在14世纪，欧洲人就已认知到了“龙”在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传统下的内涵差异。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依然对中国龙的翻译方法困惑不已。我们再来细读一段李炳学对1580年《葡汉词典》中“以蛇译龙”的解释：

字典中龙字出现两字，亦即定义了两次。第一次简直无从下笔，可从当页手迹特别混乱看出。利、罗二人当然找不出龙的葡文对等字，懵懂下只好从《韩非子·说难》或许慎《说文解字》一类古籍，粗略将之归于“虫”(bicho/bichinho)属，然后再如前此西班牙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里所述听闻，加上蛇(serpens)字以为说明。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复合字——“虫蛇”或“似蛇之大虫”(bicha-serpens)。这个名词或字，当系此书上欧人首次以欧语成就的中国龙的译法。如此欧译，在某一意义上表明利、罗二公亦如艾儒略，深知欧洲于中国龙之为物也，“向无斯说”，否则，他们不至于左支右绌，在传译上笨拙至此。话说回来，中国也有龙演化自巨蛇或蟠的传说，何况二者形态确近，是以《葡汉辞典》二度定义时，干脆单挑一字，就以葡文的蛇字“serpens”说之。<sup>②</sup>

这部词典出版于1580年，由此可知，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仍在沿用“以蛇译龙”的跨文化转码策略。究其原因，李炳学的解释恰恰再次说明，彼时的欧洲人认知到了“中国龙”在欧洲语境下的缺席，但他们仍然未能找到更为恰当的翻译方法，又鉴于龙与蛇形态相近，并且龙

<sup>①</sup> 参见李炳学《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的始末》，《中外文化关系论稿》，第44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56页。

源于蛇，他们不得不继续“以蛇译龙”。

李寅学对中国龙的外译策略提出独到见解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延续思考的空间。我们不禁追问：“以蛇译龙”在16世纪的欧洲视域下表征了何种文化内涵？这种错位的文化符号结构又投射出了彼时彼地的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何种集体看视姿态？以及作者为何要对一种异质文化进行如此改写？这组设问也指向了本文的目的：本研究以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塑造的“金蛇王权”为逻辑切入点，把时空置放于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语语境中，并基于中西经贸和文化交流史重构那一阶段欧洲视域下的中国形象被“他者”塑造的合法化过程。

## 二、他者凝视下的大明帝国：中世纪欧洲人的“金蛇王权”想象

让我们的思考不妨走进“1586年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中华大帝国史》，以探索“金蛇王权”的文化内涵。此版由克林诺·赫拉尔多（Querino Gerardo）出版社于1586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出版发行，是32开本，共有368页。<sup>①</sup>序言部分依次刊登了教皇西斯托五世（Papa Sixto V.）和西班牙国王颁发的特许证、错误校勘表、本书定价、致国王陛下的御前会议大臣、西印度院院长，尊敬的费尔南多·德·维加·丰塞卡先生的献词（Fernando de Vega y Fonseca）和两篇致读者献词及十四行诗。正文分为两部分，每部分有三卷。第一部分是对明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化、信仰、礼仪和习俗的概述，第二部分再现了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第三部分则是欧洲教士的环球旅行札记。可见，《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的记

<sup>①</sup>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Madrid: Querino Gerardo, 1586.

述。拙作《〈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善本和中译本源流考述》曾进行了详细考辨并指出,《中华大帝国史》最具学术参考价值的一版并非是其西班牙语首版,而是“1586年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sup>①</sup>因此,本文以此修订本为研究底本。我们注意到,“金蛇王权”在此修订本中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是在文本的第一部分第三卷第八章第65页,其西班牙语原文译成汉语是(González de Mendoza 1586: 65):

这12位内阁大臣在宫廷内主持朝廷的日常事务。大殿装饰得极为富丽堂皇,殿内摆放着13把交椅。其中,有6把金椅和6把银椅,既华贵又造型奇特。第13把尤为华丽,置于其他12把椅子中间,还镶嵌了许多贵重的宝石。金椅上方还有一顶绣着国王的徽章的锦缎华盖。如前所述,那是用金线绣成的蛇( *Estan bordadas las armas del Rey, que son, como se ha dicho, unas serpientes texidas con hilo de oro* ).<sup>②</sup>

上述文本向我们揭示了一条关键信息:“蛇”( *serpientes*<sup>③</sup> ),是中国的“国王”( *rey* )的权力符号。不容忽视,门多萨的文化建构中包含了两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首先,门多萨误解了龙与蛇在明代的文化内涵。《中华大帝国史》出版于1585年,门多萨记述中国之原型正处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而龙是大明皇帝的独享权力符号,禁用于官僚阶层。其次,门多萨把大明王朝的皇帝用西班牙语指称为“rey”,即国王。本文选择沿用原文本中的误读和误译,以此向汉语读者重现16

① 参见高博《〈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善本和中译本源流考述》,《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2期,第154页。

②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Madrid: Querino Gerardo, 1586, p. 65.按:译文是作者自译,文中未标明译文处均为作者自译。由于汉语和西班牙语的不可通约性,我们在此处及下文中的必要之处,都标注了门多萨关于“金蛇王权”的西班牙语原文表述。

③ “*serpiente*”是“蛇”在西班牙语中的单数形式,“*serpientes*”是复数形式。

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看视姿态。

“金蛇王权”的第二次出现是在文本第二部分第一卷第十七章第165页，其译成汉语是：

他们在街上偶遇总督手下的一位巡抚正从总督府回往官邸。他端坐在一顶鎏金的象牙轿之上，锦缎帷帘上绣着盘结的蛇。如前述，这是国王的徽章 (Las armas del Rey que son unas serpientes enlaçadas)。<sup>①</sup>

“蛇”再次被改写成了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结构。

关于“金蛇王权”的第三处记述是在文本第二部分第二卷第七章第240页，其译成汉语是：

巡抚端坐在一把用象牙和黄金制成的极为奢华的椅子上，上端的锦绣华盖绣着一种盘成一团的蛇纹饰，那是国王的徽章 (Las armas del Rey, que son, como ya hemos dicho, unas serpientes enlaçadas)。他前面还摆了一条案，天色已暗，案上点了两根蜡烛，还放着墨砚和纸。巡抚宝座背后的白墙上绘有一条十分凶悍的龙，龙的口、鼻和眼里都喷出了火。神父们得知，中国衙门里都有这类画作悬挂，那象征着官员执法威严公正 (Frontero del assiento del Virey, estaua la pared blanca, y en ella pintado un muy fiero Dragon que lançaua fuego por la boca, ojos, y narizes...)。<sup>②</sup>

鉴于汉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我们在上述三段中译文

<sup>①</sup>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s y otra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Madrid: Querino Gerardo, 1586, p.165.

<sup>②</sup> Ibid., p. 240.

中都注释了“蛇”与“龙”在“1586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中的西班牙语原文表述。其中，“蛇”的西班牙语书写均是“serpiente”。此外，上述文献还提及了“龙”，其西班牙语拼写是“dragon”，这也是整部读本中唯一的一处对“龙”的描述，并且门多萨还明确指出，“龙”象征着“中国法官执法威严和无所畏惧”。<sup>①</sup>显然，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再次误解。如前所述，“龙”在明代中国是皇帝的独享权力符号而官僚阶层禁用，并非象征官员的执法威严。对整部读本考辨至此，我们认识到：门多萨在“1586年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中华大帝国史》中建构了三次大明帝国最高权力的符号结构，即中国国王的徽章是一种用金线绣成的蛇纹饰。

### 三、金蛇王权与文化改写：大明帝国在欧洲视域下正面出场

探讨至此，我们不禁继续设问：“金蛇王权”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语境下隐含着何种文化表征意义？如前所述，“蛇”在《中华大帝国史》的西班牙语原著善典中的文化表征意义仅限于，这是中华大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符号。显然，我们无法从该文本中认知“蛇”在彼时西班牙语语境下的全部文化内涵，也难以分辨出彼时的欧洲对异质的中国文化持有何种看视姿态。因此，为了解答这个疑问，让我们的审视不妨走进世界上第一部西班牙语单语词典《卡斯蒂利亚语或西班牙语宝鉴》(*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ñola*)，以下简称为《西班牙语宝鉴》。

当下汉语学者对这部词典的学术价值仍然鲜为知晓，这是第一部用西班牙语来定义西班牙语词汇的词典，同时也是欧洲第一本通俗语

<sup>①</sup>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 Madrid: Querino Gerardo, 1586, p. 240.

言的单语词典。1611年,《西班牙语宝鉴》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出版,编者是塞巴斯蒂安·德·科瓦路瓦斯·奥洛斯科(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 Orozco)。诚然,《中华大帝国史》是在1585年问世的,而这部词典出版于1611年,其不可能构成门多萨的直接参考书目。然而,《西班牙语宝鉴》首次在西班牙语语境下对“dragon”(龙)和“serpiente”(蛇)的能指和所指,以及文化表征意义进行了总纳,这无疑为我们解读“金蛇王权”在16世纪西班牙语语境下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佐证。

首先,我们来细读词典对“龙”的释义。第一条注释从词源上解释了西班牙语“dragon”源于古希腊文“δράκον”,如其所述:“龙是存活多年的蛇,因而体形硕大,据说龙生有翅和爪。”<sup>①</sup>可见,“龙”在16世纪的欧洲视域下,首先被理解为存在于自然界的一个物种,而非仅仅作为一种神话符号存在于彼时的欧洲文化记忆之中。并且“龙”与“蛇”同源,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体型的差异上。释读至此,我们认识到,从13世纪到16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一直沿用着一组错位的文化转码符号,即用“蛇”来翻译中国龙,并且“蛇”是作为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力符号存在于中世纪欧洲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之中的。这种认知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龙”和“蛇”是同一物种的集体认知。

我们不妨再把“龙”的语用释义译成中文并予以细读:

龙有诸多象征意义。其中,罗马大军的旗帜上就绘有龙的图案,这象征着罗马统帅君临万物,正如史诗《奥维德》第七卷中的诗句:“大地上孕育的凶猛的不眠之龙”。龙还是(罗马医药之神)伊斯卡尔普奥(Esculapio)的信物,因此,龙还象征着医生给病人问诊时的高度小心谨慎。此外,龙还是帕拉斯女神为保持

<sup>①</sup> 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 Orozco, *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ñola*, 1611, usoz 6948, 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 Spain, p. 329.

贞洁而持有的圣物。赫斯珀里得斯的果园里看守金苹果的也是一条巨龙。<sup>①</sup>

我们从上述释义中提炼出了“龙”在中世纪的西班牙语语境下的两条文化内涵：一是威严和征服，二是谨小慎微。

倘若上述释义被理解为相对积极的文化表征意义，以下的三条释义则具有明显的负面意涵。让我们继续释读词典中的释义：

民间自古就有这种说法：要想成为一条蛇或龙蛇，就要先吃掉许多条蛇。要想成为皇帝或统治世界的君王，就必须吞噬掉许多国王和王子：成为王中王，人中人。因此，龙被释义为贪婪和贪吃的象征。此外，龙还是魔鬼的代名词，《启示录》第12章中就提及了“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们与恶龙的争战”。最后，龙还意指在耶稣成为救世主前后，迫害教会和上帝子民的暴君、君主、皇帝、国王和异教徒。<sup>②</sup>

由此我们解读到了三层负面意涵：第一，“龙”贪婪和贪吃，第二，“龙”是魔鬼的代名词，第三，“龙”还是迫害耶稣的暴君、君主和异教徒。特别是，我们关注到，最后的两层释义把“龙”形塑成了一种文化禁忌符号。

诚然，要对“龙”和“蛇”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性进行辨析，我们需要对“龙”的释义也予以释读。《西班牙语宝鉴》对“龙”作了如下解释：

西班牙语“serpiente”源自拉丁文“serpens”和“serpentis”。通常我们把一种想象中长着翅膀和巨大脚爪的长虫称作蛇，所有

① 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 Orozco, *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ñola*, p. 329.

② Ibid.

蛇类都属于地上爬行科目。我们称之为蛇，是因为所有毒蛇和蛇类都是在地上爬行。人类公敌把蛇这种野兽当作对付人类的工具，并伪装成蛇来骗过圣母。《圣经·创世记》第三章中指出：蛇是上帝创造的一切野兽中最狡猾的动物。耶和华也对蛇诅咒道：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到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为严厉的诅咒，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sup>①</sup>

由此可知，“蛇”的寓意较为简单，其仅被解释为狡猾与善骗的代名词，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蛇”并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文化表征意义。

探讨至此，我们对“龙”和“蛇”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西班牙语语境下的文化内涵予以总纳。“龙”，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文化内涵。一方面，龙象征着威严、征服、谨慎和聪敏；另一方面，龙秉性贪婪，是魔鬼的代名词，还是迫害教会和上帝子民的暴君和异教徒。需指出的是，最后两条释义尤为引起我们的关注。透过这两层解释，我们得以认识到西班牙语语境下的“龙”还隐含了某种“恶龙”的文化禁忌之意。与此同时，该词典对“蛇”的解释则较为单一化，仅赋予了“蛇”狡猾与善骗的寓意。

思考至此，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龙和蛇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文化传统下都具有负面寓意，但是，“恶龙”作为一种文化禁忌符号给欧洲读者带来的心理冲击力，远远超过了“狡猾善骗的蛇”。因此，如果门多萨把“龙”直接转码到西班牙语语境下而不加以任何文化调适，则可能使得大明帝国以一种“暴君和异教徒”的形象呈现在彼时的欧洲视域下，从而建构出一种令欧洲人憎恶的他者之中国形象。然而，使用与“龙”同源且形似的“蛇”，来意指大明皇权也并不是适当的翻译。尽管“蛇”的负面内涵在欧洲视域下，尚未达到某种文化禁忌的程度，但其在彼时的西班牙语语境下，却也不具有任何正面的

<sup>①</sup> 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 Orozco, *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ñola*, p. 27.

寓意。因此，讨论至此，我们终于理解了欧洲早期汉学家“以蛇译龙”的苦衷，此举颇有在“蛇”与“龙”之间，两害相逢取其轻的考量。如此看来，“以蛇译龙”确是李炳学所言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而并非是最合适的译文。

借助于与门多萨所处时代最为接近的西班牙语词典，同时，这也是第一部西班牙语单语词典，我们终于厘清了“以蛇译龙”背后的文化立场：用“蛇”来塑造大明皇帝的权力符号，在中国文化传统下被视作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亵渎，而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文化传统下，这却象征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这样一种优越的异质文明表示充分的尊重，也表达了与中国进行对话的渴望。也因此，“金蛇王权”并非是作者纯粹因草率所致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更应被视作一种异质文化改写的符号。

#### 四、金蛇王权：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次 “他者”形象重建

让我们的思考再递进一层，门多萨在这部读本中塑造了“金蛇王权”的文化符号，其触及的更深层的问题是：16世纪的欧洲为何对中国给予如此充分的尊重？我们如何对这种类型的中国形象被“他者”塑造的过程进行重构？不容忽视的是，欧美世界并不总是允许中国形象在其视域下正面出场，如格里高利·布鲁（Greogory Blue）在《现代中国和西方社会思想》（“China and Western Social Thought in the Modern Period”）一文中就指出，大约从18世纪中后期起，欧洲对中国的看视姿态就由尊重转为了蔑视。<sup>①</sup>

现下汉语学界关于域外中国形象的解读，周宁的研究最为全面和

<sup>①</sup> 参见〔加拿大〕格里高利·布鲁：《现代中国和西方社会思想》（Greogory Blue, “China and Western Social Thought in the Modern Period”, in T. Brook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0）。

深入。<sup>①</sup>他也关注到了门多萨之书的重要学术价值，认为其塑造了一个优越的中华大帝国形象，并把这种形象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意义归类为想象中的乌托邦。<sup>②</sup>并且他还在福柯的话语权力的理论框架下，对这种类型的中国形象在欧洲被合法化看视的过程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关键在于“西方假设了‘东方’这样一种优越的异质文明用于自我批判与超越，其隐喻了西方现代文化自我意识与无意识中的忧虑与渴望，以及追求知识、财富、自由和理性等西方现代性自我的核心意义”。<sup>③</sup>

周宁的新方法论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界的争论。如王晓平指出，他不是从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原因，而是从心理上进行说明，这种观点之间的演绎脱离了对史实的分析，而陷入了一种唯心主义论断。<sup>④</sup>此外，周云龙也对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的知识立场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周宁深受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影响，却忽视了这一理论学说旅行到中国本土后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sup>⑤</sup>

前辈学人的批评与质疑，为本文对16世纪欧洲视域下的中国形象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我们不禁反思：现下汉语学界相关学者从形象学的立场，来批评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大多是局限于福柯的话语权力和后殖民批评等单一的知识结构展开的。这种批评不仅逻辑单一化，并且还因操用西方理论话语而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因此，本文的最终目的就是对这种单向性的

① 周宁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系列研究中多次提及了“西方”，由此引发了汉语学人对这一术语的合法性问题的质疑。为此，周宁指出，他在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中是保持充分文化自觉的，但因找寻不到更恰当的术语，而不得不使用这一表述。因此，我们此处谨慎地使用了“域外中国形象”的表述。

②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68—69页。

④ 参见王晓平《“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方法论问题——评周宁跨文化研究系列论著》，《文艺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52页。

⑤ 参见周云龙《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学术月刊》2012年第44期，第18页。

- 知识结构进行解构性的批评。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学理性判断：“金蛇王权”作为16世纪欧洲视域下“他者”塑造的中国形象的一种经典且具象化之呈现，其被合法化看视的过程是在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期，借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统合而进行自律性构建的结果。
- 就让我们的思考进入这一命题并回溯至16世纪，并首先对那一历史阶段的中西经贸交流史进行审视，以探寻“金蛇王权”的观念及其表征的中国形象被“他者”塑造过程中的资本掌控因素。《中华大帝国史》的首版于1585年出版并以西班牙语书写完成，那时的西班牙正处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后期（Felipe II de España）。<sup>①</sup> 同时期的中国则正处于大明万历年间，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晚明”。因此，晚明的中国构成了门多萨所想象的“中华大帝国”之原型。<sup>②</sup>
- 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樊树志曾在《晚明史》中，对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了详细考据并指出，大明帝国除与邻国进行传统的朝贡贸易外，还参与了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远程贸易之中。中国大量出口丝织品和瓷器等商品的同时也少量进口海外土特产。而问题在于中西贸易关系严重不平衡，中国处于明显的顺差地位，欧洲和日本又都使用白银进行贸易结算，因此，白银就源源不断地从美洲和日本等地输入中国，这也是晚明时期中外贸易的显著特点之一。<sup>③</sup> 也因此，大明王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对于此议题，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则进一步指出，在16世纪的全球海外贸易中，“美洲白银中的一半
- 
- ① 菲利普二世 (Felipe II de España, 1527—1598)，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1556—1598年在位）和葡萄牙国王（1580—1598年在位）。
- ② 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的西班牙语原著善典中，把明代中国称为“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若我们采用直译的转码策略，其翻译成中文是“伟大的中国王国”，这显然是门多萨对明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误解。为此，现下的两部中译本都采用了归化的转码策略，把其翻译为“中华大帝国”。
- ③ 参见樊树志《晚明史》上，上海：复旦大学，2016年，第57页。



甚至更多都流入了中国”。<sup>①</sup>此外，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德国知名学者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中，也对明清海外贸易交往中的白银流通数据进行了估算并得出结论，“明代中国占有全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并且这些白银是货币形态的资本”。<sup>②</sup>

讨论至此，我们不妨再来细读一份16世纪的西文史料，这是一个葡萄牙人在1590年写给菲利普二世的奏折。其译成中文是：“如果批准西印度与中国通航，则王国中的银币将全部流入中国而非西班牙；因为中国是如此之大，有许多货物出售，所以无论携带多少银币前往，中国都将把它全部吸收了进去。”<sup>③</sup>这段史料投射出的是欧洲陷入某种深层焦虑的集体情绪，这种焦虑则源于与中国的远程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态势，与此同时，欧洲人的担忧也恰恰佐证了晚明时期的中国在全球贸易秩序中长期所处的掌控地位。可见，16世纪中西经贸交流的历史经验和中外学者们的相关研究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在门多萨进行中国书写时代，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是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

以此结论为基点，让我们的思考再度回到万历年间，以对彼时中西双方的国内局势进行一次微观审视。史学界普遍认为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的西班牙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我们也需注意到，门多萨成书于16世纪80年代，彼时的西班牙已处于其统治的后期，国内局势由盛转衰。那时的西班牙已陷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不仅多次发生国家破产，导致债台高筑，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境内各类商品

① 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2年，第445—446页。

② [德]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25—130）。

③ [美] 艾玛·海伦·布莱尔、[美] 詹姆斯·亚历山大·罗伯逊编著：《菲律宾岛史，1493—1898》（Emma Helen Blair,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ume VII. Charleston SC: BiblioLife, 2008, p. 134）。

也极为匮乏并致使物价高涨，急需向外采购商品进行补给。<sup>①</sup>除经济危机外，其内政和外交也举步维艰。对内，菲利普二世平定了西班牙境内摩尔人叛乱，并使用了宗教法庭等方式对抗一切给天主教统治地位带来威胁的异教势力，造成了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sup>②</sup>对外，西班牙与法国、英国、葡萄牙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陷入了战争漩涡。

与此同时，让我们的看视再转向同时期的中国，彼时的大明王朝正处于“万历中兴”（1572—1587）。“兴”指的是万历在位的前15年，得益于张居正改革等因素，国库收入大增，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明廷严厉整顿了吏治，社会展现出了阶段性的欣欣向荣之象。然而，“万历中兴”下也潜藏着各种社会危机。正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所述，“万历一朝最引人关注的大事，除了张居正和万历新政外，莫过于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叛乱，东征御倭援朝，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这三场重大军事行动在西北、东北和西南几乎同时展开”<sup>③</sup>。尽管这些军事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不可避免地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耗了大明王朝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动荡。此外，晚明的政治没落和官场腐败也早已是人尽皆知。然而，尽管盛世下隐藏着危机，大明王朝通过海外贸易参与到了早期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吸纳了来自全世界的巨额货币资本——白银，并成为了资本全球化初始阶段的赢家，这却是无法撼动的史实。

至此，本节从宏观上对中西经贸交流史进行了回溯，并从微观上对同时期中西两国的具体局势进行了看视，最终得以认知，“金蛇王权”及其表征的令人向往和尊重的“他者”的中国形象，隐喻了16世纪的欧洲对其本土陷于全面危机的集体焦虑，也表达了欧洲对大明王

<sup>①</sup> 参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二卷（Fernand Braudel, *El Mediterráneo y el mundo mediterráneo en la época de Felipe II* , trans. Monteforte Toledo, M. Rojas, W. and Simón, V. México D. F.: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53, pp. 516-519）。

<sup>②</sup> Fernand Braudel, *El Mediterráneo y el mundo mediterráneo en la época de Felipe II* , pp. 226-230.

<sup>③</sup> 樊树志：《晚明史》上，第385页。

朝奢华富足的物质生活的渴求。如果我们把思考的逻辑再递进一层，则察觉到了导致这种类型的“他者”的中国形象在彼时彼地的欧洲生成并合理化的资本驱动力。大明帝国作为全球化初始进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和获益者，其凭借海外贸易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资本，这就使得明代中国成为了欧洲的逐利对象。可见，早期全球资本的流向与聚集，自律性地策动了这种类型的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合法化看视过程。

## 五、对“金蛇王权”的重新诠释：多重历史 经验的自律性建构

讨论至此，我们不禁再度设问：资本因素是否是欧洲把明代的中国形象视为正面集体想象物的决定性因素呢？众所周知，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专权的国家，其原则甚是恐怖”<sup>①</sup>。黑格尔（G. W. F. Hegel）在《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中批判中国的停滞时，更是犀利地讽刺“当他们过渡到具体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sup>②</sup>。

然而，这些欧洲学者批判的18世纪“愚昧落后”的中国却正处于“乾隆盛世”。因此，我们不妨对明清经济史进行重新审视。“乾隆盛世”之“盛”，主要体现在那时的中国已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和政局相对稳定，特别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有了显著的发展。不少欧美经济学家对乾隆年间的经济总量做出了估算。其中，安格斯·麦德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值最高，他指出那时大清王朝

①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9页。

②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

的GDP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sup>①</sup> 尽管中国学者普遍质疑他高估了大清王朝的经济实力，但正如中外学者所普遍认同的那样，乾隆年间在对外贸易中仍处于长期顺差是不争的历史。如此看来，从经济总量上看，乾隆盛世时的中国在世界经贸秩序中仍然享有优势的地位，但却遭遇到了欧洲学者广泛的严厉批判甚至是蔑视。这一现象表明，资本动力并非是塑造他者之中国形象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与“万历中兴”颇为相似的是，“乾隆盛世”下同样隐藏着多重风险。我们仅以吏治贪腐为例，早在清朝初年，这个问题就已存在，到了乾隆中期以后逐步恶化，甚至那时的腐败已经渗透到司法、行政、教育、经济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尽管乾隆皇帝对此有所了解，也按法惩治了一些贪腐行为，但其对官场奢风和贪腐之风的遏制却是杯水车薪。由此可知，欧洲学者对大清王朝的批判也并非是纯粹的主观演绎。

讨论至此，我们就这个现象给出一个对比并再度设问：从作为货币资本的白银流通史看，“万历中兴”和“乾隆盛世”时期的中国，在全球经贸秩序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并且明清两代盛世下也都埋藏着多重社会危机。然而，为何门多萨对晚明的没落视而不见，反而大为赞叹其社会制度的种种优越性？而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欧洲知识分子，却严厉地批判了大清王朝的愚昧和落后？换言之，欧洲为何在16世纪选择尊重中国，而大约从18世纪末期却集体转向了蔑视中国？对此问题，周宁自20世纪90年代在跨文化形象学的视域下再次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人把中国和西方视为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格局设置了现代性的基本困境。”<sup>②</sup> 让我们对他的观点进行细读：

<sup>①</sup>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Danvers: OECD publishing, 2007, pp.43-44)。

<sup>②</sup>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第84页。

无论是乌托邦还是意识形态类型的中国形象，这两种话语机制的文化功能都在于构建一个与西方现实差异甚至相反的他者。16世纪的欧洲仍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其需要从东方他者中寻找可以利用的价值来实现自我超越，因此把中国视为东方楷模，并把这一阶段的西方中国形象归入“乌托邦”式的异国形象。而进入18世纪的启蒙阶段，西方完成了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二元对立的他者失去了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构建和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可利用价值，也因此，中国形象在18世纪的欧洲被普遍否定，由乌托邦转入意识形态。<sup>①</sup>

周宁对此问题的解读深受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后殖民批评的影响，然而，正如诸多中国学者所质疑的那样，这些西方的理论学说不仅知识结构单一，其在文化立场上还陷入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樊笼。因此，以现下“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遭遇的方法论上质疑为新的理论基点，本文旨在多重历史维度中对此问题开启重新思考。

这就需要再度追溯到门多萨所处的16世纪末的欧洲，并让我们的审视先来进入人类的思想史。门多萨成书于16世纪80年代，其正处于欧洲思想史上的“文艺复兴”末期。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是文艺复兴学术史研究的奠基者，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堪称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文艺复兴的专著。在这部读本中，他把“文艺复兴”的思想成果概括为“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and the man”。<sup>②</sup>

这也是文艺复兴思潮的两大主题。其中，“人的发现”指的是文学

① 周宁：《天朝遥远》（上），第346页。

② 参见〔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ans. S.G.C. Middlemore, 1961,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p.155）。

家或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揭示出了人的尊严、才能和自由等人的崇高价值，而这显然是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经院哲学的另一种价值观。“自然的发现”指的并非是近代自然科学，而指的是那一历史阶段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发现、欣赏和赞美大自然之美。显然，在这种“人和自然的发现”的思潮的孕育下，16世纪的欧洲较之于中世纪，展现出了更为开放、宽松和包容的社会氛围。又何况地理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物质利益驱动着整个欧洲向外进行探索，去重新认识欧洲以外的世界。因此，16世纪的欧洲呈现出的宽松和包容的社会氛围，首先就为接纳一种优越的东方异质文明并与之进行对话，乃至于对其示以充分的尊重提供了精神土壤。

此外，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延续着东方伊甸园想象的文化传统。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欧洲就流传着长老约翰关于东方的想象传说。据说，1165年，一封据称来自“长老约翰”（Prester John）的信传遍了欧洲。此信分别寄到了欧洲各大贵族的手中，如拜占庭帝国的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Komnenos），还有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及其他君主。长老约翰宣称他统治着从太阳升起之处的东方一直到巴别塔的广袤之地，他还陈述了自己的财富和国家诞生的奇迹。自此，约翰长老的国度就成了欧洲基督教徒的向往之地，这也形成了一种东方仰慕的传统，并且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了门多萨生活的16世纪。尽管后人认为此信为伪造，其主要目的是激发“十字军”东征的热情，但这种守望东方的文化传统在欧洲传承了下来。<sup>①</sup>

除了人类思想进程和文化传统上的驱动，政治和资本等因素也参与塑造欧洲语境下“他者”的中国形象。我们不妨对前章探讨得出的结论进行回顾，按人类的文明进程进行划分，16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同处于古代社会。在此宏观历史背景下，国际格局呈现出了一种东强西弱的趋向。特别是，大明帝国对全球贸易中的货币资本具有核心掌控

<sup>①</sup> 参见〔澳〕布鲁尔《长老约翰的传说和缘起》(Keagan Brewer, *Prester John: The legend and its sources*,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2015, pp. 1-4)。

力，而资本因素参与自律性策动了欧洲对晚明的憧憬，这种憧憬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大明帝国子民所拥有的那种奢华富裕的物质生活，以及通过与这个富庶的大帝国通商来赚取丰厚的利润。最后，还有一层重要的历史经验也参与塑造了这种类型的“他者”视域下的中国形象。门多萨生活在16世纪末，彼时的中西交通依然较为闭塞。尽管已有不少欧洲有识之士造访过中国，但欧洲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仍然游走于真实与想象之间，这就为欧洲的晚明想象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因此，在政治、资本、思想和文化等多重驱力的统合作用下，令人尊敬和向往的中华大帝国形象在16世纪的欧洲视域下被“他者”塑造而成，并从此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

讨论至此，让我们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把思考的逻辑再递进一步，并向前跨入17和18世纪，彼时的欧洲正在从中古时代迈入现代社会，处于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早期阶段。同时期的大清王朝则仍停留在古代社会，所谓“康乾盛世”之“盛”，就在于其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晚清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都发生了巨变。首先，引人瞩目的是，在那一历史阶段，伴随着大量的欧洲商船进入中国通商，欧洲人已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真实的中国，从而终结了曾主宰16世纪欧洲的关于中国乌托邦的想象。不仅如此，更深层的变革还在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历经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王朝战争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西欧封建制度逐渐瓦解了。最终，在多重历史的再一次统合作用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确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s）在其代表作《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中，对那一阶段世界秩序的变革加以精辟凝练的论述，我们来对其观点进行细读：“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美洲和东欧生产原料，非洲提供劳动力，亚洲供应奢侈品，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商业活动，并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将之投入工业化生产。”<sup>①</sup>此外，全球政治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穆斯林围困在欧亚大陆，他们已经控制了印度洋，从南面掌控了穆斯林。并取代了这个曾经的世界创造力中心，从此，一个新的世界中心崛起了”<sup>②</sup>。至此，欧洲已经完成了新的自我身份的构建和认同，新的世界中心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曾经“他者”塑造而成的令人向往和尊敬的中华大帝国形象，自然也就随着新的世界秩序的确立而在欧洲内部被逐渐消解掉了。

此外，思想史上的驱动也参与了欧洲视域下“他者”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社会化进程。“欧洲中心主义”的新世界秩序，是在启蒙思潮的洗礼下萌发的。这场思潮对于整个欧洲社会秩序变革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视，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以理性为武器，抨击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建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启蒙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把同时期仍停留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大清王朝普遍视为停滞落后的批判对象的思想渊源，启蒙思潮为这种批判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

## 结语

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三次“以蛇译龙”用来意指大明皇帝的权力符号，我们把这种“他者”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简称为“金蛇王权”。本文通过对第一部西班牙语单语词典，即出版于1611年的《西班牙语宝鉴》进行考辨发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语境下，“龙”仍然是一种文化禁忌的符号。特别是，在“龙”的诸多负面内涵中，有两条分别用于意指魔鬼和迫害耶稣的异教徒君主，其参与塑造了中

<sup>①</sup> Leften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0, p.465.

<sup>②</sup> Ibid., pp. 457-458.

世纪欧洲语境下的恶龙形象。与此同时，“蛇”在同时期的西班牙语语境下也含有，并且仅有负面的寓意，然而，“蛇”被赋予的“狡猾善骗”之意，显然尚未达到文化禁忌的程度。因此，“以蛇译龙”并非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草率误读和误译，而是因“中国龙”在欧洲语境下的语言及其意义上空缺，所采用的一种异质文化改写的符号结构。这种翻译方法并非是适当之举，但它却使得中国文化以一种欧洲文化易于接纳的形式在欧洲语境下出场。

也因此，“金蛇王权”作为16世纪欧洲视域下，“他者”塑造的中国形象的一种经典且具象化呈现，其隐喻了彼时彼地的欧洲对中国的尊重，以及与中国开展对话和通商的交流方略。现下汉语学界相关学者从形象学的立场来解读这种类型的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合法化看视过程，大多是局限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后殖民批评的单一知识结构中展开的。这种批评不仅逻辑单一化，并且还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从而忽视了具体的历史经验。因此，本文以“金蛇王权”为逻辑切入点，对这种单向性的研究结构进行了解构性的批评。本研究立足于中西方遭遇性语境和全球化进程，并基于中西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具体史实，最终提出了一种学理性判断：这种类型的“他者”的中国形象被合法化看视的过程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期，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多重驱力进行自律性构建的结果。而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多维历史经验在启蒙思想的大潮中，继续在欧洲文化内部进行策动，最终自律性地消解掉了曾经令人向往和尊重的“他者”的中华大帝国形象，而以一种没落的中华大帝国形象取而代之。